

中共與蘇聯關係近況

畢英賢

今（一九八二）年二月初，中共與蘇聯在北平簽署一項假道運輸協定，使中共在蘇聯領土上的轉運權擴大。就對外關係行爲而言，這是一個「合作」的行爲。幾乎在同一段時間內，蘇聯總參謀長奧加科夫（N. V. Ogarkov）訪問河內，中共的「總參謀長」訪問西沙羣島。由於中共與越南敵視形勢依然存在，也由於越南對西沙羣島有主權的要求，因此這兩名軍頭的訪問形成了隔海相抗的景象。在對外關係行爲分類內，這應當屬於「衝突」行爲。

這兩個事實似乎可以反映出中共與蘇聯關係在現階段中的特徵：「交往而不友好」，「衝突而不絕裂」。一般說來，一九七九年底蘇聯出兵進侵阿富汗以後，中共與蘇聯間的關係本質上未發生重大變化。一九八〇年四月，中共與蘇聯友好同盟條約因「到期不予延長」而失效後，也未在中共與蘇聯關係中激起有感反應。事實上，在這個條約存在的三十年中，前十二年發生了積極作用，後十八年則毫無影響。它們的關係從軍事聯盟到兵戎相見，從意識形態之爭演變成邊界的流血武鬥，最後形成國際性的外交鬭爭。在國際性的外交戰中，有幾點值得注意：（一）兩者面對面對抗的可能性降低；（二）在全球性的外交鬭爭中，比較容易獲得妥協或折衷；（三）國際性的衝突不容易引起兩國人民強烈的仇視。

在中共的宣傳中，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與「霸權主義」；在蘇聯的言論中，中共是「社會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在這種語言文字交戰中，所隱藏的重大爭執問題之一就是邊界問題。中共與蘇聯之間存在着三種談判：（一）「中蘇邊界、河流、航運聯合委員會會議」，（二）「中蘇邊界談判」，（三）「中蘇關係正常化談判」。後者於一九七九年底舉行了第一回合談判後，因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共中止了預定的第二回合會談；第二種談判自一九七八年之後尚未復會，最近屢有復會傳聞的就是指這個談判；第一種會議則是經常按期舉行的，最近一次是今年二月十日開始的。

在過去一年中，中共與蘇聯除在「霸權主義」問題上不斷相互攻擊外，爭論比較深刻的則是中蘇邊界問題。至於意識形態問題，則以蘇聯批評中共「毛主義」較多，而中共反擊則不甚明顯與有力。本文擬從意識形態、邊界問題、霸權主義及實際交往幾個層面，探測中共與蘇聯關係的近況及可能走向。

意識形態

中共與蘇共兩黨最後一次談判於一九六三年七月五日至二十日在莫斯科舉行。這個會議未能爲雙方意識形態之爭帶來任何折

衷，雖然雙方同意日後再舉行會談^①，但是事實上並未發生，遂使這次會議成爲中共與蘇共的決裂會議。當時，中共代表團以鄧小平爲首，蘇共以蘇斯洛夫(M. Suslov)爲代表團團長。蘇斯洛夫爲中蘇共理論爭執的主要人物，蘇共中央的首席理論家，也是蘇共對外政策的主要決策人之一，一向被視爲「強硬路線者」^②。因此，有人以爲他於今年元月二十五日的死亡可能會導致中共與蘇聯關係的改善，但是至今尚無明顯跡象證明此說^③。其實，近年來意識形態之爭已經不是中共與蘇聯關係中的主要因素，雙方皆有一個相似的說法：雙方之間的原則分歧，不應妨礙「兩國在和平五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和發展正常關係」^④。

七十年代以後，意識形態鬭爭的勁勢轉弱，退居中共與蘇聯衝突中的次要地位，其原因不外：(一)雙方的爭論已遠遠超過意識形態^⑤；(二)爭論的主題業已闡述無遺；(三)爭論方向已轉至「霸權主義」。例如：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半月刊在一九八一年全年二十四期中，登了兩篇論及蘇聯「霸權主義」的文章^⑥，並沒有直接觸及意識形態之爭的論著。在蘇聯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共產黨人」上，全年共登了四篇論述中共方面的論文，也以論析其對外政策爲主，但略略論到了意識形態問題^⑦。

比較雙方的出版物時，可以發現，中共對蘇共意識形態批評的文章極少；相反的，蘇共批評中共意識形態尤其是毛澤東主義的文章較多。在中共方面所以有此種表現，原因不止一端，其主要者不外：(一)中共自謂其八十年代的三件大事是「反對霸權」、「祖國統一」及「加緊建設」^⑧，沒作意識形態批評的強烈動機；(二)鄧小平掌權以後，中共在社會與經濟政策與結構方面，已作出相當程度的「修正」，甚至向「現代修正主義」的鼻祖南斯拉夫學習，因而失去了批評的立場；(三)蘇共在意識形態領域內沒有顯著變化，因而沒有批評的新主題；(四)中共的「蘇聯問題專家」，尤其是理論家不多，沒有廣泛深刻批評的能力。相反的，蘇聯的「漢學家」則很多。

註① 「人民日報」，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註②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第一頁。

註③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二年二月一日，第十頁。

註④ 「中共」外交部長「黃華的聲明」，「大公報」，一九七九年四月四日；「蘇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總結報告」，「蘇共二十五次大會資料」(莫斯科，一九七六年)第十頁。

註⑤ 「鄧小平談內外政策」，「大公報」，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三版；「與中國最有權力的人談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日，B1頁。

註⑥ 「蘇聯霸權主義的歷史淵源」，「紅旗」，一九八一年第十七期，第二十一至二十五頁；「爲老沙皇侵略擴張辯護蘇聯史學」，第二十一頁，第四十四至四十八頁。

註⑦ 「中國政策的幾個方面」，「共產黨人」(Kommunist)，一九八一年，第六期；「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週年」，第九期；「出賣的劇升——北京與國際共產運動」及「中共六中全會與北京對外政策」，第十二頁。

註⑧ 「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人民日報」，一九八〇年二月五日。

俄國從十七世紀時起，即很注意對中國的研究；共黨執政後繼續這一傳統。蘇共在與中共的蜜月期間對「漢學」固然未曾放鬆；分裂後這種「知彼」的工作也隨着加強。蘇聯研究中中國問題的機構很多，最值得注意的是「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成立於一九六六年。蘇聯現有成名的漢學家兩百六十名左右^⑩，近年來開過兩次大規模的漢學會議。相反的，中共對蘇聯的研究則落後甚多，蘇聯問題專家寥寥無幾。中共於一九八〇年才成立了「蘇聯研究所」，所長是劉克明^⑪。目前，既無關於蘇聯問題的專門刊物，也甚少出現研究蘇聯問題的書籍。因此，在中共與蘇聯的理論爭執中，中共顯然人才不足。

在意識形態爭論中，中共與蘇共早已給對方作了定論。蘇共說：「說毛主義意識形態與政策不符合馬列主義學說已經不夠，它們根本與馬列主義為敵」^⑫。中共說：「蘇聯領導集團背叛馬克斯列寧主義，對內復辟資本主義，實行法西斯專政，對外推行霸權主義……使蘇聯蛻變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⑬。蘇聯的漢學家們認為，目前中共正處於「沒有毛澤東」的毛主義的發展新階段，這種新型毛主義的特點是：在理論與實踐中強化大國沙文主義、霸權主義思想，加強反蘇主義，政治方針向右轉，發展「三個世界」的觀點，反對國際緊張的緩和，拉攏國際工人階級反蘇，把毛主義說成是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新」理論等^⑭。

在中共與蘇聯領導階層中，也有些人物的態度比較溫和。中共「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李一氓曾說過，在過去與蘇共的論戰中，「在某些問題上，我們所使用的事實依據和理論依據，有些說過了頭的，甚至有些是錯誤的」^⑮。中共前駐蘇聯「大使」、現任「外交部副部長」王幼平也說過，關於蘇聯的社會制度究竟屬於什麼性質，多有不同的看法。他說：「我認為不一定要匆匆作出結論，但要從實際出發，擺事實，講道理」^⑯。在蘇聯方面亦然。蘇聯中共問題專家古道希涅可夫(L. Gudoshnikov)說：中共並未失去社會主義基礎^⑰。蘇共中央有個對外聯絡部，專事對社會主義國家聯絡，中共迄今仍屬該部的主管範圍。在蘇共歷次代表大會（包括最近的二十六次）的總結報告中，中共仍被列在社會主義國家範圍內。蘇共中央機關在一篇未署名的論文中，重申該黨持之甚久的信心：「中國將會回復到真正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⑱。

註⑨ 「蘇聯東方學者人名錄」（莫斯科，一九七五）。

註⑩ 「大公報」，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六日。

註⑪ 「蘇共二十五次總結報告」，「蘇共二十五次資料」（莫斯科，一九七六），第十一頁。

註⑫ 「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大公報」，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第三版。

註⑬ 「毛主義是馬列主義的思想敵人」，「遠東問題」，一九八一年，第二十三頁。

註⑭ 「李一氓在軍事學院的講話（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廣角鏡」，一九八〇年四月第九十一期，第二十七頁。

註⑮ 「王幼平在中國駐外使節會議上的講話」，「廣角鏡」，一九八〇年四月第九十一期，第三十一頁。

註⑯ 「日本時報」(Japan Times)，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五日。

註⑰ 「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週年」，「共產黨人」，一九八一年第九期，第一〇〇頁。

總之，意識形態之爭目前已降為雙方關係的次要變數，但是它在雙方關係中的作用並未完全消失，而且在未來的發展中依然有可能發生正面或反面的影響。

邊界問題

與意識形態問題相反，邊界問題是中共與蘇聯在一九八一年間爭辯比較劇烈的問題之一。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蘇聯與阿富汗簽訂邊界條約，部分牽涉到「中俄續勘喀什噶爾界約」的規定。中共「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七月二十二日發表聲明，指責蘇聯在爭議地區擅自同第三國簽約劃界是非法的。於是，在中共與蘇共兩個政權間引發了一場邊界問題論戰。

八月十二日蘇聯外交部針對中共的抗議發表聲明^⑮，其要點為：(一)蘇阿邊界條約在法律上固定了兩國在該地區的現有邊界線；(二)該條約所調整的問題與別國無關，中共的攻擊乃是對兩個主權國家關係的無禮干涉；(三)「中蘇帕米爾區域的爭議地區是中國方面臆造出來的」，該地區的邊界線是「歷史形成的」，是「通過一八九四年的換文從法律上肯定下來的」，而「中國地圖對這一段邊界的畫法也是沿薩雷闊勒嶺行的」；(四)中共的聲明含有「大國慾望」與「領土要求」；(五)中共的聲明「沒有任何意義」。八月三十一日，中共「外交部」有關人士發表談話駁斥蘇聯外交部的聲明^⑯。列舉事實證明，中蘇帕米爾爭議地區問題是沙皇俄國侵略中國的產物，是歷史遺留下來的重大懸案之一，絕非中共的「臆造」。中共的聲明指責蘇聯當局歪曲、否認以至偽造歷史，擅自與第三國簽訂涉及中蘇帕米爾爭議地區的邊界走向條約。因此，中共「堅持解決中蘇帕米爾爭議地區懸案的正當立場」。

蘇聯當局宣稱該地區邊界線是「歷史形成」、「從法律上肯定下的」，其所持的根據是「一八九八年換文」，也就是一八九四年中俄雙方就帕米爾問題互換的照會。中共堅持該地區邊界未定所根據的是一八九四年「中俄續勘喀什噶爾界約」。事實上，這個界約是一個對中國不利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帕米爾地區的大片領土被沙俄割佔。不過，中共仍認為這個界約是「確定現今中蘇兩國在帕米爾地區邊界走向的唯一有效的界約」。歷史的事實是，一八八四年界約簽訂後，沙俄繼續入侵中國，清廷抗議，一八九四年雙方互換照會（也就是蘇聯外交部所謂的一八九四年換文）。沙俄方面向中國清朝政府建議「應暫時保持雙方軍隊各自的位置」，「直到俄國和中國間對帕米爾劃界問題得到最終解決為止」。中國方面在一八九四年的復照中鄭重聲明，在採取這

註⑮ 《真理報》，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二日，第四頁。

註⑯ 《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

項措施時，「並不意味着放棄中國對於目前由中國軍隊所佔領以外的帕米爾領土的權利」。因此，一八九四年的換文並不能取代一八八四年「中俄續勘喀什噶爾界約」的法律效力。

一九八一年十月下旬，中共「外交部」宣稱，中共曾收到蘇聯的照會，建議恢復兩國邊界談判。同時，中共正在考慮這個建議。蘇聯外交人士也證實了這個消息^②。且不論雙方宣佈消息的時機與策略意義，這個談判能不能在短期恢復，尚難逆料。即使開得成，能否有重大成就，也令人懷疑。在雙方考慮恢復談判之前，雙方不僅因帕米爾地區界線走向發生政府間的論戰，而雙方的專家亦已就「中蘇邊界談判的癥結何在？」這一問題進行過辯論。

首先中共發表了李滙川所著題為「中蘇邊界談判的癥結何在？」的文章^③。蘇聯方面以牙還牙，發表了「蘇中邊界談判的眞正癥結何在？」的長文^④。李滙川是中共「外交部」的特別助理、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也是一九七九年中共蘇聯政府關係問題談判的副團長。

依照中共的說法，「中蘇邊界談判的癥結」在於：(一)中共主張肯定有關目前中蘇邊界的條約是不平等條約；蘇聯堅持這些條約是「促進睦鄰關係」的條約；(二)中共主張以這些條約爲基礎通過談判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蘇聯除了這些條約外，還要以所謂「歷史形成」線和「實際守衛」線爲談判基礎；(三)中共主張，任何一方違反這些條約侵佔另一方的領土，原則上必須無條件歸還對方；蘇聯方面却說，中蘇之間不存在領土問題；(四)中共主張簽訂平等新約代替不平等舊約，勘界立標；蘇聯指望簽訂新的不平等條約，「採用現代手段之界牌」，以鞏固其新的擴張成果；(五)中共主張雙方武裝力量從爭議地區脫離接觸，並爲此簽訂一個維持邊界現狀的協定；蘇聯政府則拒絕脫離接觸，阻撓簽訂維持邊界現狀的協定^⑤。

根據蘇聯方面的說法，「蘇中談判的眞正癥結」在於北平對蘇提出「領土要求」，這些要求的表達方式是「不平等條約」及「爭議地區」概念，是俄羅斯侵略中國領土的論點，是中共方面在邊界地區的活動；也在於中共方面不願尋求使雙方可以接受的解決邊界問題的辦法^⑥。蘇聯方面說，中共方面所作的解說，不是「蘇中關係惡化」的原因，而是「蘇中關係」惡化的結果，北平政策及其與帝國主義相互協作的產物^⑦。

註① 《大公報》，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一版。

註② 這篇文章載於一九八一年七月復刊的《國際問題研究》季刊上，但是在該刊尚未出刊之前，《人民日報》於六月十七日先以摘要形式發表。

註③ 達利涅夫 (P. Dalinev)，「蘇中談判的眞正癥結何在？」，《國際生活》(Mezhdunarodnaya Zhizni)，一九八一年，第十期，第七十三至九十頁。

註④ 李滙川，「中蘇談判的癥結何在？」，《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七日。

註⑤ 達利涅夫，「蘇中談判的眞正癥結何在？」，《國際生活》，一九八一年，第十期，第七十七頁。

註⑥ 同註④，第九十頁。

鑑於雙方在邊界問題上的立場，一九六九年以來中共與蘇聯在邊界問題談判中沒有實質進展的基本原因何在，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有一點應當特別注意的是，中共與蘇聯關係的惡化在先，邊界問題發生在後。在中共與蘇聯關係蜜月時期，中共沒有提出邊界問題，甚至在一九五〇年二月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一九五四年十月的中共與蘇聯政府聯合宣言中，以及一九五七年元月雙方政府的聯合聲明中^{②③}，也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人民日報」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七日提前摘要刊載「國際問題研究」的論文，正值美國國務卿海格訪問北平結束之時，其用意至為明顯。這樣做，至少可以提醒美國，中共與蘇聯間存在着歷史性的邊界問題，在短期內很難輕易解決，因此中共與蘇聯「和解」是很少可能的，美國可以放心地「聯中制蘇聯」。事實與中共言論皆顯示，中共已把「中蘇邊界問題」作為其在對外關係中的一個工具，視實際需要，時放時收。

霸權主義

在過去一年多之中，中共與蘇聯爭辯與互相攻擊最猛烈的仍舊圍繞着對外政策問題。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在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決議說：「在對外關係上，必須繼續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②④}。在目前中共的政治語言中，霸權主義就是蘇聯，正如中共「十一大」的「政治報告」所說，蘇聯「對外推行霸權主義」，因此中共矢言「堅持同它的霸權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鬭爭」^{②⑤}。

中共認為蘇聯在霸權主義的實踐上不是「機會主義」而是有一套「全球戰略」。中共把這個全球戰略的基本目標和主要手段概括為：(一)以美國為主要對手，以歐洲為戰略重點；(二)從中東、非洲側翼包抄歐洲，置歐洲於欲戰不能的境地；(三)以亞洲太平洋為重要戰略區，東西兩線相互策應；(四)加緊向第三世界其他重要地區或薄弱地區擴張；(五)以軍事實力為後盾搞核訛詐，以「緩和」作幌子玩弄政治謀略，並輔以「經濟誘餌」；(六)通過全面戰爭以外的一切手段在全世界取勝，必要時準備戰而勝之，然後稱霸全球^{②⑥}。

北平方面曾就西方對蘇聯戰略的反應評論說，過去幾年，西方國家曾經企圖以自我克制來軟化蘇聯，結果蘇聯乘機以更迅猛

註②③ 一九五四年九月底，赫魯曉夫率蘇聯黨政代表團訪問北平，於十月十二日發表聯合宣言；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八日，周恩來在莫斯科與布加寧發表聯合聲明。

註④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大公報」，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第七版。

註⑤ 「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大公報」，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第三版。

註⑥ 啓亞，周紀榮，「蘇聯究竟有沒有全球戰略？」，「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日，第七版。

的速度大事擴軍，使力量對比轉變，利於蘇聯而不利西方^{⑤0}。

蘇聯在一九八二年内仍將沿着一九八一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六次代表大會所制訂的方針，繼續推行它的全球戰略。中共並強調，蘇聯不斷增強的軍事實力，是它在全世界革命爭霸的本錢。中共機關報預測，蘇聯不會放過機會在東、西、南三個方向同美國加緊爭奪，守住已取得的陣地，伺機向外出擊。蘇聯在最近將來的戰略動向是：(一)將重點突出西線；(二)繼續加強東線；(三)伺機突破南線^{⑤1}。

很多年來，每當中共官員或機關刊物論述蘇聯的全球戰略時，經常強調「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近來的言論仍然堅持此一論點，並且解說道，國際上的「熱點」並非「重點」^{⑤2}，重點從未從歐洲東移^{⑤3}。中共並指出，為配合其全球戰略，莫斯科已發動了新的外交攻勢。中共把這種攻勢稱之為「雙重楔子攻勢」，一重楔子插進美國及其盟國之間，另一重楔子打進美國的主要盟國西德和日本內部，其長期目標是瓦解西方盟國，近期目標是挫敗歐洲核防務計劃、打擊美日同盟^{⑤4}。

中共在研究蘇聯霸權主義的歷史淵源時說，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推行全球霸權主義，不是一個偶然現象，而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經濟根源、思想根源與歷史根源。蘇聯的前身是沙俄帝國。在幾百年過程中，歷代俄國沙皇不斷向外擴張，建立了龐大帝國^{⑤5}。中共認為列寧執政時期及史達林掌權初期，蘇聯在對外關係上曾與沙俄帝國傳統政策，澈底決裂。史達林後來片面歌頌與強調大俄羅斯民族及其文化和歷史，因而在對外關係上犯有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赫魯雪夫與布里茲涅夫集團則完全背離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在全世界推行霸權主義。因此，中共下結論說：蘇聯霸權主義是沙皇主義和布里茲涅夫主義的結合^{⑤6}。為了對抗蘇聯，中共呼籲並強調「第三世界一些國家包括中國，同西方一些國家建立起聯合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戰略關係」^{⑤7}。中共認為，這種關係是對付日益增長的蘇聯威脅的重要基礎。在一九八一年初，中共提出創立「聯合抗蘇的格局」的論點，並斷定：聯合抗蘇的格局業已形成，儘管有曲折，却仍將繼續發展^{⑤8}。這些論點，皆遭到蘇聯方面嚴厲的反擊。

註^{⑤0} 評論員，「事實和謊言」，〔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日。

註^{⑤1} 詹天日，「年初看蘇聯的戰略動向」，〔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二月六日。

註^{⑤2} 陳雄，「熱點並非重點」，〔世界知識〕，一九八一年，第十期，第二頁。

註^{⑤3} 啓亞等，「重點從未從歐洲東移」，〔世界知識〕，一九八一年，第十期，第三頁。

註^{⑤4} 晨曦，「莫斯科新的外交攻勢」，〔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註^{⑤5} 李元明，「蘇聯霸權主義的歷史淵源」，〔紅旗〕，一九八一年，第十七期，第二十一頁。

註^{⑤6} 同註^{⑤5}，第二十四頁。

註^{⑤7} 裴獸農，「略論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戰略關係」，〔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七月八日。

註^{⑤8} 武仁，「聯合抗蘇的格局形成了嗎？」，〔世界知識〕，一九八一年，第二期，第二至三頁。

蘇聯認為，中共正在進行毛主義「現代化」，對毛主義作實用性質的修改，以便為聯合「帝國主義以及各式各樣的修正主義與機會主義創造意識形態基礎」。「大國霸權主義」、「中國化的馬克斯主義」及「反蘇主義」是改良毛主義意識形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³⁹。因此，在中共六中全會後，蘇聯對中共政策的理解，同蘇共二十大時一樣，那就是：「中共內部政治正在發生變化，其真正意義有待時間證明。時間將證明，當今中國領導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毛主義的遺產。但是，令人惋惜的是，現在還談不上北平的對外政策，有什麼好轉的改變」⁴⁰。

根據蘇聯的理解，中共對外政策的目標是實現「大國沙文主義、霸權主義意圖」，想在本世紀末把中共變成「強大國家」，躋身一等大國⁴¹。中共爲了掩飾其對外活動的真正目的，經常提出一些「理論」作爲幌子。在六十年代內，中共提出了「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概念，爲其形「左」而實右的冒險主義活動辯解，起初藉此爭取「社會主義國家」，後來則圖拉攏開發中國家。在六十與七十年代交替之時，中共急遽「右轉」，爲了轉向「資本主義世界」而提出了「與兩個超級大國鬭爭」的教條；至七十年代中期，這個教條逐漸被毛澤東所提出的「三個世界」概念所取代。到了七十與八十年代交替之際，中共爲了加強其「親帝國主義、反社會主義、反蘇主義」的政策走勢，而把這個概念發展爲「反霸權主義鬭爭」⁴²。最近，中共又倡議形成「聯合抗蘇的格局」以代替原來組織「中國·美國·日本·西歐反蘇聯盟」的號召。蘇聯分析家指出，中共欲以「反蘇格局」取代「反蘇聯盟」的原因是：(一)在任何有形的聯盟中，中共由於軍事經濟落後必然處於從屬的地位，一切必須聽從美國；(二)中共至今未放棄「坐山觀虎鬪」的戰略⁴³，在「聯盟」的約束下，很難施展這個戰略。

蘇聯政府機關報指出，中共政策方針的制定不是取決於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在不變的、邪惡的戰略架構內，尋求新的方法、手段與策略；其在國際舞臺上的努力方向則爲：強化東西對抗，加劇軍備競賽，恢復冷戰，呼籲西方對蘇聯採取強硬政策並建立軍事優勢，贊成北約組織加強核子武力等。因此，莫斯科方面指稱：北平政權是「國際緊張的催化劑」，在國際舞臺上採取破壞性立場，在聯合國內從未提出任何鞏固和平的建設性建議⁴⁴。

檢視了中共與蘇聯相互攻擊對方霸權主義對外政策方針之後，難免不會有一個疑問：究竟誰是真正的霸權主義者？中共還是

註³⁹ 弗拉傑米諾夫(O. Vladimirov)，「中共六中全會與北平的對外政策」，「共產黨人」，一九八一年，第十二期，第八十六頁。

註⁴⁰ 同註³⁹，第八十九頁，「真理報」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註⁴¹ 鮑瑞梭夫(O. Borisov)，伊凡諾夫(V. Ivanov)，「中國活動的幾個方面」，「共產黨人」，一九七九年，第十三期。

註⁴² 阿帕林(G. Apalin)，「北平·大國主義霸權主義教條」，「國際生活」，一九八一年，第十二期，第二十七頁。

註⁴³ 同註⁴²，第三十五頁。

註⁴⁴ 阿卡馮諾夫(S. Agafonov)，「北平號召什麼？」，「消息報」(Izvestiya)，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蘇聯？或兩者都是？不論那個答案正確，人們皆可以獲得到這麼一個印象：共產政權的力量到達某一程度時都易於傾向霸權主義，即使越南與古巴也不例外。

實際交往

在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共與蘇聯關係「友好」程度的明顯的指標是雙方互相的貿易總額，五十年代將近二十億盧布，至六十年代底祇有五千多萬盧布；五十年代底是雙方友好關係盛極而衰的時期，六十年代底是雙方關係達到衝突的頂點時期。七十年代開始後，雙方貿易才緩緩回升，不過其總額始終徘徊在三億與四億盧布之間，未有重大突破。例如：一九七九年互相貿易總額為三億四千七百萬盧布，一九八〇年則為三億四千萬^{④⑤}，一九八一年較一九八〇年約減少百分之二十五^{④⑥}。也可以說，中共與蘇聯關係中祇剩了貿易關係，而這種關係「冷而不斷」。在這種關係上，有幾個特點：(一)貿易額的控制權操於蘇聯手中，中共經常想多買一點東西，但蘇聯方面不輕易鬆口；(二)中共輸出多是農產品，蘇聯輸出的都是中共極需的工業產品；(三)雙方貿易是物物交換。

近年來，在中共與蘇聯間除了「冷而不斷」的貿易關係外，也偶爾發生一些「衝突」行爲或「合作」行爲，茲將最近一年內較顯着的事件引述於後。

首先看看含有「衝突」性質的事件。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蘇聯與阿富汗簽訂邊界條約，涉及中蘇邊界爭議地區，引起中共與蘇聯外交部一場論戰（本文已述及）。

七月四日，中共處決一名蘇聯間諜。罪犯溫志泉原爲黑龍江「朝陽公社」社員，不滿現實，一月間越界向蘇聯情報機關投降，五月接受蘇聯情報機關指派潛回蒐集情報被捕，判刑處死。

八月間日本防衛廳透露，蘇聯於過去一年內在遠東地區增加五個師，使總數變爲五十一個師，在外蒙增加了兩個師，邊海省增加一個師^{④⑦}。據報導，中共曾在毗鄰外蒙古的敏感沙漠地區舉行一九四九年以來的首次大規模演習。

九月十八日中共「外交部」照會蘇聯代辦，抗議「蘇聯當局不顧兩國間在保持正常外交關係情況下所應遵守的起碼國家關係

註④⑤ 「對外貿易月刊」(Vneshnaya Torgovlya)，一九八一年三月號附錄。

註④⑥ 「大公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第二版。

註④⑦ 「大公報」，一九八一年八月七日，第三版。

準則，不斷誣陷中國駐蘇人員的行爲」。原因是，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九日蘇聯中央電視臺播放了一部紀錄片名叫「郭秀山（譯音）的供詞」，片尾註名是「克格勃」（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供的，其內容是中共特務機關指派了一名在押殺人犯去蘇聯從事間諜活動。中共指責這是一種低級的「反華」編造，「要求蘇聯當局立即停止這種卑鄙活動，否則，蘇聯方面應對此而引起的一切後果承擔全部責任」^{④⑧}。十月四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伊里切夫（I. Ilichev）交給中共駐蘇「大使」一份照會，指出「郭秀山的供詞」完全是事實。事實上，試圖挑起仇恨的不是蘇聯而是中共自己。照會又指出，二十年來中共當局進行無所顧忌的、誹謗蘇聯及人民的運動，編造「蘇聯間諜」案件，以使使中國人民尤其是青年仇恨蘇聯。蘇聯方面警告說：「如果中國當局試圖採取任何挑戰行爲，那麼中共政府應對一切後果負責」^{④⑨}。這件公案最後不了了之。

中共與蘇聯之間最近一年內也發生一些含有「合作」意味的事件。

一九八一年二月，中共與蘇聯國際河流航行聯合委員會，在蘇聯境內舉行第二十三次例會，並達成了部分協議。

八月間，中共透露，已有一些在蘇聯境內的新疆華僑於一九八一年內回新疆探親。在蘇聯的新疆各族華僑達三十萬人，以往由於蘇聯規定回國探親的華僑祇能從中國的滿洲里對過的口岸出境，要到新疆探親就得多付幾千公里的旅費，因此很少有新疆華僑從蘇聯回國探親^{⑤①}。在一九八一年回國人數雖然不多，但這是一個開端。

十一月，中共體操隊到達莫斯科參加第二十一屆世界體操錦標賽。中共「新華社」從莫斯科發出消息說，中共體操隊與蘇聯人民進行了「友好交往」，一名蘇聯公民還說：「我們兩國人民一貫是友好的」。此外，體操隊還同「蘇中友好協會」的積極分子會晤，代主席齊赫赫文斯基（S. Tikhvinsky）向他們致詞；該隊對這次會見表示感謝，並「向蘇聯人民和運動員表示良好的祝願」^{⑤②}。

接着，齊赫赫文斯基於一九八二年元月十四日到了北平，作爲期兩週的「私人訪問」。齊氏與中國關係極深，一九三九—四〇年在迪化任副領事，一九四三至四五年任蘇聯駐重慶大使館二等秘書；一九四六至四九年在北平先後任副總領事及總領事。他也是蘇聯著名的漢學家，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蘇中友好協會」中央理事會副主席，實際上是代主席，也是蘇聯外交學院的院長。中共與蘇聯關係惡化後，該協會的幹部已很久未曾訪問過中共，因此他的北平之旅頗引起外交界的注視與揣測。在北平期間，他曾與中共「外交部東歐司司長于洪亮」作了「禮貌式」的會晤。姑不論其北平之行的目的何在，實際活動如何，這個訪問本身

註④⑧ 《大公報》，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九日，第二版。

註④⑨ 《消息報》，一九八一年十月四日。

註⑤① 《大公報》，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第三版。

註⑤② 《大公報》，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八版。

就是值得注意的事件。也許人們還記得，一九八〇年三月間，另一名蘇聯中國問題專家、外交官卡必查（M. Kapisa）也在北平作了七天的「私人訪問」。很少會有人相信，蘇聯官員會到別的國家尤其是相互仇視的中共去作「私人訪問」。

今年二月六日，中共與蘇聯簽署了假道運輸協定。儘管這是原有運輸協定的「現代化」，是增加有關雙方運輸公司之間貨櫃運送的一項協定，依然有人視之為雙方關係緩和的證據。

以上種種跡象也許可以說明，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正經歷着「漸變」的過程。

結 論

縱觀中共蘇聯關係近況，可以理解：

(一) 在中共蘇聯未來關係發展中，意識形態糾紛已不再是一個主要因素；但是，中共雖然放棄了極左路線，意識形態之爭仍無調和可能。

(二) 中蘇邊界問題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也是一個民族利益問題，很難輕易調整；不過，對中共而言，邊界爭議已成爲一個工
具性問題，可按實際需要或收或放。

(三) 現階段雙方鬭爭的重點仍在外交領域內、國際舞臺上；雙方對對方內政的批評趨向緩和。

(四) 在雙方實際交往中，「合作」行爲有輕微增加之勢。

因之，中共與蘇聯關係總的發展趨向是：維持現況，伺機「關係正常化」。